

佛的孤独

曹乃谦中篇小说选

曹乃谦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曹乃谦 著

中国广播出版社

CARR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的孤独: 曹乃谦中篇小说选/曹乃谦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43-5277-4

I. 佛… II. 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784 号

佛的孤独——曹乃谦中篇小说选

作 者	曹乃谦
责任编辑	林 曦
封面设计	SDD
版式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277-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生命的形式

祝大同

曹乃谦的中篇小说选《佛的孤独》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里我表示祝贺。但作为《序》这篇文字,本不该是由我来写。

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是马悦然先生写的导读,乃谦自序。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他是一位警察,也是山西大同的作家。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

“我简直不管中国内地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

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

所以我觉得一篇要放在乃谦小说集子前头的文字不应该由我来写。我人微言轻,没有分量,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在那儿的。这篇文字应该由一个重量级的文学人来写才好。

可是乃谦让我写我的“乃谦印象”,这我不能不写。

我和乃谦应该是一九八六年初冬认识的,要是没有弄错,那时他还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照他自己在《孤独的记忆》里的话:“只是在三个月前,也就是说在七月份,才刚刚儿给《云冈》编辑部送去一个短篇小说,叫《我与善缘和尚》。”他是在一九八六年的夏天开始小说创作的,那年他已经37岁。就在一九八六年的初冬,大同文联在大同郊外的一处工人疗养院召开笔会,我那时也是刚刚进入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月刊《山西文学》编辑部不久,作为看大同地区小说稿件的责任编辑参加了这个笔会。我记得那个会上乃谦也带了一篇小说,是不是这篇《我与善缘和尚》已经记不得了,应该不短,但肯定不是“温密家”。那次笔

会有机会让乃谦接触到圈子里的同好,有机会直接比较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对我说:“请记住,两年后我会让你大吃一惊。”他还对大家说:“我有力量!我要将你们一个个都打倒!”转过年的春天,一九八七年文学杂志《云冈》二月号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

再过一年,到了一九八八年,这一年《北京文学》的六月号发表了他的“温家窑风景”系列中最初的五篇,尊重汪曾祺老人的意见,标题用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曾祺写了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北京文学》同期发表。乃谦还获得了这一年《北京文学》的新人奖。这组小说又在内地的《小说选刊》、台湾的《联合报》和香港的《博益月刊》转载,先后被收入十几种小说选集当中,后又被马悦然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照汪曾祺老人的话:“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也是我的遗憾。我应该是这组小说其中几篇手稿最早的读者之一,乃谦写好以后一定是先寄给了我。如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能在我服务的刊物发表,我是这几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今天我一定有许多自满。遗憾的是没能在我的手里发表出来。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乃谦带着他刚刚出版的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距离一九八八年六月发表第一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至今已经将二十年。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生活在今天的环境里已经不大容易弄得明白二十年前的社会气氛。中国社会不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四个小时里就放开到今天这个程度。放开,不放开,有限度放开,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二十年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

马悦然说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我也说,乃谦的艺术天赋极高。前几年,我曾经企图写一篇关于乃谦的短文,开篇说马悦然先生喜欢乃谦写的小说,可惜他没有听过乃谦唱的民歌,那是很大的遗憾。我觉得乃谦的民歌唱得一点儿也不比小说写得差。乃谦6岁开始学习音乐,笙管笛箫,二胡、三弦、扬琴、小提琴样样能行,他的二胡和扬琴的演奏技巧已经是当地一流水平。近几年更是一根竹箫不离左右,这回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也带了这根长箫,平添了许多文人的飘逸。

二〇〇四年九月,马悦然有机会听了乃谦唱的雁北民歌要饭调。



红瓢儿西瓜撒白糖，
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那时，乃谦刚刚做了胆结石手术不到一个月，底气稍嫌不足，而且那是乃谦第一次见到马悦然，我想他不会放得开，一定唱得中规中矩，所以我觉得先生还没有能听到乃谦最忘情的歌声。

我最近一次听乃谦唱歌，是去年秋天陪浙江作家到大同，在酒桌上众人请乃谦给大家唱歌，乃谦自然不能驳了大家的面子，站起来就唱，唱得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张弛得当。坐在一边，我知道乃谦当时也只是那么随便一唱，真神未动。要让乃谦把歌唱好，一是得把酒喝好，我认识乃谦时他已经不喝白酒，只喜欢啤酒，过了5瓶，才有了那么一点儿微醺，心湖才有了一点儿荡漾；二是现场得有一个冰雪聪明让他心仪的听众，按照表演上的话说，唱情歌总得有个内心视像。这两样，缺一样那些歌就唱不出真味道。那次是在孟县的梁家寨，那天中午乃谦就已经唱得高兴，下午去藏山的车上还唱，晚上接着中午的酒劲儿又喝。那天人合适，气氛也好，乃谦唱出了状态，那真是唱得按都按不住了。就那次听他唱了“家住内蒙古凉城”的要饭调，他坐在中央，比画着学瞎子拉个二胡，唱得那个好呀。后来再没有那样的一回了。马悦然说他觉得乃谦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所以在乃谦小说的语言中能够读出音乐的韵律节奏。

一九八六年，乃谦三十七岁时因为跟人打赌才开始文学写作。三十七岁开始写作，并不迟，鲁迅先生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也已经三十七岁。尽管乃谦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脱产做了三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的合同制作家，他始终也不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也使他的创作一直处在一种松弛和随心所欲的状态。当他逐渐进入自己写作高峰的时候，他的母亲病了，照乃谦自己的话，得的是“疯魔病”，生活不能自理。乃谦是个孝子，服侍母亲多年。这些年里除了做些零星的笔记以外，再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作品。他在二〇〇〇年年底写道：“等老母亲天年后，我再动手写我的《离天二尺八——伤逝九章之九》，把这个长篇献给我的伟大的恩重如山的老母亲。”现在，乃谦可以写了。已临近花甲的年纪，无论回首，还是前瞻，都有了更沉着的思想，我对乃谦有着更多的期待。

佛 的 孤 獨

马悦然希望乃谦的小说繁体字版出版以后,内地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让先生失望。先生说:“我简直就不能懂为什么内地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如我这样生活在其中的人倒也不难明白,所以寂寞真也难免。

我觉得其实对乃谦来说,写作不过是他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倒也并不一定就要有很多人喝彩。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目 录

生命的形式(序言)	祝大同
山的后面还是山	1
陨 歌	38
佛的孤独	61
鱼翔浅底	92
冰凉的太阳石	136
部落一年	169
换 梅	212
后 记	248

山的后面还是山



姥姥村在应县南山脚下，是个很穷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可我就好到姥姥家，不想在大同住。大同不好玩儿不说，孩子们还尽骂我。骂我“村香瓜地皮菜儿，黄瓜水萝卜儿”。我是个独生子，没有哥哥姐姐来苦护我，我就老躲在屋里。我妈问我你咋不出去跟孩子们耍，我说我想回姥姥家。我妈就把我送到姥姥家。

姥姥家只有我姥姥和二妗两个大人，剩下就是俩孩子。一个是我表哥，叫忠孝，比我大四岁。一个是我姨妹，叫麦穗，比我小一岁。表哥是我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大妗在大同工作，把他留在村里跟奶奶做伴儿。他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姥姥。姨妹叫我姥姥也叫姥姥。姨妹是我姨姨的孩子。姨姨就嫁给本村，在我姥姥房后头住。后来姨姨病死了，我姨妹就常年住在姥姥家。

从大同回来一进姥姥院，我就先爬梯子上房顶“啊欧——啊欧——”的大声喊叫。那些落在树上的喜鹊们和卧在房檐头的银灰色的鸽子们，原准备再等一会儿就进窝去睡觉，这下又重新打开翅膀在满天的彩霞底下旋呀旋呀飞。我又看见疤存银“羔儿羔儿羔儿”地赶着羊群进村了。乱叉叉的羊蹄踏起一大片尘土，像烟雾，和天上的红云连接在一起。二豁子老汉领着牛群也从东沟上来了。牛犊犊们尥着蹶子跑在前头，母牛们“哞呜，哞呜”地在后边吆喝。

我知道，他们这都是在欢迎我的到来。

我太高兴了。我真想让两条胳膊也变成翅膀，也张开飞向空中。

姥姥家的木梯很高，斜搭上房还能高出房檐一大截。姥姥家的木梯也很结实，村里谁家死了人都来借我姥姥家的木梯去抬棺材。姥姥怕我们上房摔下来跌着，就让二妗把梯子放倒顺墙根躺着。但是经不住我哭闹，姥姥只好又让二妗把梯子尽量斜地搭上房，为的是不太陡立，好让我们上下时能扒稳当。我们找来

麻绳把两头拴在梯子的高处档上,然后我们坐在麻绳上悠悠地打秋千。这是二舅给发明的。二舅在大同煤校念书,有的是文化,发明个这,对他并不是难事。可是姥姥却把二舅骂了一顿,还说跌坏孩子们就找他算账。我在梯子上也发明过一种好耍法。那就是把最低的两根档子用麻绳来回绕,缠绕得密密的。我连躺带靠地让麻绳兜住,说是大王爷的宝座。姥姥夸我这个发明好,说跌不着孩子们。她自己也常常在做营生做乏后,坐躺在我这宝座上歇缓。

有个上午我睡懒觉起迟了。忠孝表哥已经上了大庙书房,麦穗姨妹也不知到哪儿耍去了。二姪姪从后锅铤舀出温水给我洗了脸洗了手,还捧住我的脸给搽了海蚌油。

阳婆晒得院里暖烘烘的。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在墙根刨吃的。它刨出一根黄虫虫没舍得自个儿吃,咯咯咯地把小鸡叫过来。小鸡们一齐下手抢。把小虫啄在这儿啄在那儿,最后让一个给叼住了,噙着就跑,想找个偏静的地方躲起来吃。别的小鸡不让,扑扇着翅翅去追。母鸡又咯咯咯地叫,怕孩子们打起来。

我靠躺在宝座上,两腿垂吊着,一下一下地踢磕着梯子。正孤零零地憋得慌,街门被推开了,有个小女娃站进大门洞。她左手抠着右手心儿,喊:“姐姐——”我瞎答应说:“哎——”她说:“你又不是我姐姐你咋答应?”我跟她招手说:“你来,你来。”

小女孩没犹豫,过来了。她光屁股穿着红腰子。头发乱蓬蓬的,脸脏兮兮的。胳膊、腿、脚板儿都很脏。可我觉得她长得真好看真吸引人。我赶快跳下宝座说:“咱们耍来。我有好耍的。”

我的好东西都在一个高粱秸秆编的大方匣匣里装着。我先拿半块小镜儿对住阳婆照,阳婆又从小镜上给打出一道光,我拿这光去晃对面的大门洞。大门洞是阴凉地,光柱更真更亮。晃了一阵,没意思了,我又找出块玻璃瓶底,让阳婆打过瓶底照她的手。我来回的找,在她的手上找见一个小光点,不一会儿,她赶快把手缩回去了。她是让光点给烫了。我说,来,咱们烫猫儿去。老黄猫就在院窗台睡觉。我把光点对住它的鼻头,不一会儿,老猫让烫醒了,弓起身伸了个懒腰跳下窗台。

我的大方匣匣里还好多好耍的,有小花鼓儿有小铜镲,有泥公鸡有木枪,有铅笔头钢笔帽儿算盘珠珠,还有好多好多别的東西。她最喜欢我的那支口琴。那是二舅替下的,给了我。当时我还不会拿口琴吹调子,但我会拿口琴刮大风。



一口气从这头吹到那头,再返回来一口气从那头吸到这头。这么来来回回快速地吹吸,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就叫做刮大风。我给她让她刮,可她“弗弗”的光呼气,咋也吹不响。我又叫她敲花鼓儿,她也不会,只是乱吧嗒,没点儿。我敲给她听,“咚叭咚叭,咚叭哒咚叭。”我一敲,对面的南山也在敲:咚叭咚叭,咚叭哒咚叭。我又敲鼓帮,“喀哒喀哒,喀哒啦喀哒。”我一敲,对面的南山也在敲:喀哒喀哒,喀哒啦喀哒。

我喊着问南山:“你是谁——”南山也喊着问我:“你是谁——”

我说:“我是招人——”南山也说:“我是招人——”

我骂南山:“学人猴儿——”南山也骂:“学人猴儿——”

小女娃在一旁嘻嘻地笑。她说你跟山哑哑还吵架呢。我问山哑哑是谁。她指着南山说,山哑哑就是山哑哑,那就是山哑哑。我说咱们到南山看山哑哑去。她说我不敢,南山有狼。我说等我们长大。她说,噢。

我们又要打秋千。她不会独个儿打,得我带。我悠荡得很大。前头就要碰住梯子,后头就要碰住院窗台。她头埋在我怀里,把我抱得紧紧的,先是咯咯笑,后来笑着笑着好像又是要哭,还“甬啦甬啦”地嚷。我放慢了劲儿。当秋千快停下来时,她又抬起头说:“再闹,再闹。”我又加劲儿。悠呀悠呀,她又喊“甬啦甬啦”。就这么来来回回的直到我悠不动才算。荡完秋千我们又要别的。我用绳儿拉着没了轱辘的玩具汽车满院跑,她在后头追。吓得鸡子们躲到东躲到西地逃命。我还给她吹那个吹不响的小洋号。吹是吹不响,可我能吹响,“嘀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哒!”我这是用嘴嘀哒。

正要得高兴,她说,我回呀我妈叫我呢。我说你白说。她侧起耳朵说,你听我妈在房上头叫我呢。我说你白说。她说,不信咱们上房瞭。

姥姥房后的那溜房,我姨夫院的房顶上站着个女人,手圈在嘴上喊:“穗儿——穗儿——”她回答了一声就下房走了。

问姥姥才知道穗儿是我姨妹的堂妹妹。她叫我姨夫叫叔叔。我姨妹叫她爹叫大爷。她家住那个院的东房,我姨夫住西房。她有哥哥没姐姐,小名儿就跟着我姨妹排,叫个二穗儿。人们叫惯了就叫她穗儿。姥姥专门吩咐我说,她有个愣舅,是她妈结婚时带过来的。姥姥告给我甬去她家,说看愣舅打的。我说噢。

姥姥村因为穷,在夏天家家户户都不给没上学的孩子们穿衣裳。男孩子腿巴吊着鸡鸡蛋,女娃们露着肉瘤子,都不觉得羞。一个个在土里滚得像个泥猴

儿。穗儿也一样。

姥姥村西有条季节河,就叫西河。我常跟孩子们到河滩耍。一出村口那儿的河滩上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都是半截半截地埋在沙土里。那儿有我的“大洋马”,“小卧车”,还有“坦克”。那天我领姨妹和穗儿到西河滩耍,让她俩坐在我的小卧车上,我“滴滴”地开着,要去大同。我还让她们骑我的大洋马,开我的坦克炮。

阳婆毒毒地照着,我们跑来跑去的都很热。穗儿用她那脏乎乎的手抹来抹去地擦汗,把脸和脖子抹出横一道竖一道的黑道道。我一下想起该给她洗洗澡。

西河的河床挺宽,但有水的地方并不宽,窄的地方我们都能从水面上跳过去,西河的水也不深,但很清凌,能看见水底五颜六色的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沙石。我们把穗儿的红腰子脱掉,让她坐进水里。水太浅,淹不住她的腿。我们三个人一齐动手,头头头撅起屁股从水底往出刨沙子,刨出个大沙坑儿。沙坑儿里的水起初很浑浊,可不一会儿就澄清了,露出个大沙盆让穗儿坐在里头。我和姨妹又从一处水湾子挖刮了好些滑滑溜溜的红胶泥,顶胰子,抹了她一身,连脸蛋儿上耳朵上都抹,把她抹成个红泥娃娃。我们笑,她也笑。她一笑,红泥脸上露出白白的牙齿。真好看。她一笑,就快速地发出那种又像是哈哈又像是咯咯咯的声音。真好听。我想看她笑,我想听她笑。我在给她搓身的时候,故意挠她的胳肢窝和两肋,引逗得她那脆铃铃的笑声一串串地从清凉的水面飞起,越过堤坝上苍绿的大杨树,飘向蔚蓝的天。

我们还给她把红腰子泡在沙坑里,蘸着红胶泥胰子搓揉后,又在水里摆净,捞出来披在大洋马身上往干晒。我们还让她面迎天躺在沙滩上,再给她身上捧满沙子,把她苦住。之后又让她坐进河里的那个沙坑,给她往下洗那些粘在身上的沙土。她很听话,让干啥就干啥,随我们任意摆弄。当这第二次给她搓洗的时候,我在水底用手抓摸她大腿根儿的肉瘤子。她一怔,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我。她没恼也没笑,只是用大腿把我的手紧紧夹住。她把头稍偏偏,低低地说:“你动我呢。”当时我一定也清楚我这么做不好,要不为啥在我姨妹从大洋马身上取下红腰子往过走时,我赶快把手抽了出来,慌忙站起迎接姨妹,问红腰子干没。

在往村里返的时候,穗儿她已然是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她胳膊腿和脸蛋子整天露在外面,但也没有像村里其他的孩子们那样,被风吹日晒成黝黑色。她的皮肤仍是那么白生生的细嫩,加上黑的油亮的头发和红腰子,使我想



起五彩小人儿书上画着的那个哪吒。看着她那可爱的样子,我提出说咱们回去耍过家家。她们都说噢。我提出要过家家,主要是想让穗儿给我当媳妇儿。

我们要过家家,每回都是穗儿当新媳妇儿,我当新女婿,我姨妹当妈。

二舅有个半揭盖儿的书柜,是他在村里上学时用的。村里上学孩子们的书柜大小不说,那样子都像是放在炕上的桌子。二舅的书柜在堂屋的半八仙桌上放着,我蹬着煊火用的小板凳,爬上半八仙桌,就能揭开盖儿翻找里面的东西。我从书柜里翻出大年写对子的红纸,用水蘸湿,给穗儿搽红脸蛋儿抹红嘴唇儿。第二次抹红嘴唇时她把嘴抿得紧紧的,我说你不张开不好抹。她说吃了红可苦呢。我试着用舌头舔了舔那红纸,果真。以后我就很小心地给她抹,生怕再苦了她。我们给她的红腰子兜里装些事先拣好的白色的半透明的小石子儿顶冰糖,为的是我们要笑新媳妇时和她耍。她给我们喜糖时不是用手指头捏着给,而是用整个手攥着一块,再把小拳头搁在你伸得很平展的手掌上,然后才松手把那块冰糖丢在你的手心儿。我们还给她头顶苦一块和姥姥要出的红英丹士林布,把她头盖住。姨妹搀着她从大门慢慢地往院里走,我在后边用嘴吹着我那响不了的小洋号:嘟噜哇啊嘟嘟哒啊,嘟噜哇啊嘟嘟哒啊……像这样的游戏我们不知道玩了有多少回,但从来没有耍腻过。每次耍起来都是那么认真、细致,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完善。

这次,我们是在西院耍娶媳妇儿。西院就在姥姥家的西隔壁,也是姥姥家的院子,顶以前住过人,后来不住了。房屋倒塌了,房顶的椽梁都没有了,只有半人高的墙。院子里种着好多向日葵,黄色的葵花饼散发出一股股香气,招来蜜蜂蝴蝶满院飞舞。我们用笤帚把还没有完全塌陷下去的土炕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找来块破席片铺在炕上。写对子的纸叫我们用光了。我们就摘些红色的野花代替,给穗儿搽红脸蛋。可是无论怎么抹,都不上色,最后干脆就把花儿瓣用唾沫贴在她的脸上。我们把还不熟的葵花籽剥了一撮儿顶饭饭。刨起甜草苗的根顶糖糖。摘些狗舌头叶当菜菜。姨妹不知从房后头谁家的地里偷回一把紫色的莲豆角,当肉肉。我们这次要坐席,要真的吃。

我说:“酒。娶媳妇要喝酒,可我们老也不喝酒。”姨妹说:“我给回家端水去,顶酒。”我说:“不行。水是水。水不是酒。”拿啥当酒呢?大家都动脑筋想。

“尿!”我说,“拿尿。尿跟酒是一样的。”姨妹说:“对着呢。东院二姪常骂东院二舅说,就好喝二两猫儿尿。”

我说：“咱们没猫尿。咱们喝咱们自个儿的尿。”姨妹皱着眉头说：“我刚刚儿在房后头尿过。这阵儿没了。”

我也觉得当时尿不出来。问穗儿，她偏着头想了想说能。我让她站起来，叉开腿。我用豁口蓝花笨碗就在她裆底的那处像莲豆花的地方。等了一阵儿，豆花心儿下有尿出来了。尿满了豁口碗，也热乎乎地尿了我一手。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要过家家的孩子们喝过尿没，我可是真喝过，也真的就是喝过我穗儿媳妇儿的尿。咸咸的，甜甜的，辣辣的，香喷喷的。

吃完“席”，姨妹“妈妈”说，“天黑了，睡觉哇。”她摘了十多张向日葵的大叶子当盖窝，给我和穗儿盖在身上。我和穗儿都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嘴里“咳儿——呼，咳儿——呼”地假装打酣睡。可是我们睡了好长时间，还不听姨妹“妈妈”说“天亮了鸡叫了，起哇”。我睁开眼看看，姨妹早不知去哪儿了。我爬起来把西院的没顶房都找遍了，仍不见她。返回姥姥家寻找，原来她正帮着二妗拉风箱。二妗说，“你们听，穗儿妈在房顶叫穗儿呢。穗儿呢？”

我赶忙返到西院。穗儿还在那儿盖着向日葵叶子面迎天躺着。有两只白蝴蝶飞舞着，想落在她头上插着的那朵红花儿上。我咋推她她也不理我，我说鸡叫了天亮了她也不理我，我说你妈叫你吃饭呢她也不理我。原来她真的睡着了。我的小媳妇儿盖着向日葵叶子真的就那么给睡着了。

忠孝表哥在大庙书房念初小。他背课文咋也背不会。有时候我听他背都听得记住了，可他还在那儿背。“小花猫拉着大花狗，大花狗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萝卜。”他越背越糊涂，越背越闹不机明谁该拉谁。我最好跟表哥到书房上学了。他也想领我去，想去跟人谝谝他有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弟弟，而且不仅是脸蛋儿，就连脖子和耳朵后头也是白白净净的。

大庙学校有两个教书先生。教一、三年级的是个穿着黄衣裳的退伍军人，姓陈。教二、四年级的是个戴着圆眼镜儿的老头，姓刘。学校没有五、六年级。五、六年级叫高小，在南泉村。我一去书房，先生们就让我给唱歌儿，刘先生还把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里，让我教学生唱。学生们原先只会唱个“向前向前向前”，还有“雄赳赳气昂昂”。这俩歌儿是陈先生教的。我教学生们唱“大红花呀开满地”，还教“嗨啦啦啦嗨啦啦啦”，还有别的好多好多的歌儿。有整的也有半个的。“二呀么二郎山”就是半个。可他们都听不出是半个，都扯起嗓子跟着我瞎



唱。刘先生和陈先生也摇晃着脑袋跟我唱。我一看他俩，他们就不唱了。我尽量躲着不看他们。

我好听先生们讲课。我听先生讲课时，学生们都想让我挨住他们坐，临末了，我老是被独个儿坐在顶后头的那个长得挺俊气的大个女子拉到她那儿。她都快十五岁了，是个大人了。没人敢跟她争我。只要我一来，我就是她的。她说怕我瞧不着黑板，就把我抱在她怀里。

自从认识了穗儿，我没单个儿到过书房，每次去都领着她。那次刘先生正讲课，我又领着穗儿进了书房。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原根儿也是这里的学生似的，没经谁的许可也不和谁打招呼，就那么大大咧咧上了炕。那个俊气的大个女子又把我接到她的怀里。穗儿坐在我们旁边。我听讲听的好好儿的，那个大女子把手伸进我背心摸我肚皮。摸得我痒痒的，可我也不躲。她摸着摸着往下挪挪，摸着摸着往下挪挪，直到摸住我的那儿才不再往走挪了。我不管她，她摸哪儿我也不管她。

先生讲的是公鸡、狗和狐狸的故事。有只公鸡跟狗一块儿过日子。狗哥哥打猎一走，狐狸就来了，给公鸡说好听的。说得公鸡忍不住就给狐狸开开门，一开门，就被狐狸抓走了。当时狗哥哥还没走远，听到了呼救声，赶快返回来救下了公鸡弟弟。一连这么好几次都是这样。最后一回狡猾的狐狸等的狗哥哥走得翻过山头它才敲门，才来给公鸡说好听的。说得公鸡又动了心，忘了以前的危险，就把门给打开。结果又被狐狸抓住拖在背上。公鸡又拼命地喊：“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走我，就要拉到它的窝。狗哥哥，快救我。狗哥哥，快救我……”

听到这儿，穗儿在我旁边给呜呜地哭出声。

“嗯？”刘先生停了讲，“谁？”他摘下眼镜儿严厉地问。找哭的人。

大家都看穗儿。刘先生见是穗儿，态度和软下来，问：“穗儿俺娃哪儿难受？”穗儿哭着说：“狐狸就要把公鸡给吃了。公鸡再也见不着他的狗哥哥了。呜——呜呜。”听了这话大家都哈哈笑起来。“笑啥笑。”刘先生严厉地呵斥学生，“这说明穗儿是听进去了。看看人家，看看你们。”学生们不笑了。刘先生冲着我：“招人，甬叫穗儿哭了，你俩给摇铃儿去。”

学生们在我们的铃声中像放出圈的羊，挤挤撞撞地蹦出院。刘先生又让我教学生们做游戏。以前我教过他们“饿狼抓小羊”，“瞎子逮拐子”，还有“丢手绢”。这次我教学生们“跳房”。这个游戏我教过穗儿。刘先生让我俩给做示

范。“跳房”游戏有个动作是：八叉开腿，弯下腰，把手中的沙包儿或石块儿从两腿当中扔到身后的“房”里。当时我还穿的是开裆裤。在我弯下腰正瞄着“房”要往出扔石块儿，陈先生照我光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看这大后生，鸡鸡蛋都跌出了。”他虽是轻轻拍了一下，我也不疼。可他却把我给羞着了。我气恼恼地站起身，拉住穗儿就走。那个大个女子在后头叫我也并不理。从那以后，我俩再没到过书房。我们才不稀罕到你烂书房呢，我们有的是好耍处。

村边有好几个场面。场面的地让风扫得光光的，让雨洗得净净的。我一到场面也就敢把鞋脱掉，光着脚板儿在场面跑。还故意把脚板踏得啪啪响，为听好听。我们还骑着碌碡当毛驴。我和穗儿还有我姨妹，每人骑一个，闭住眼晃动碌碡。碌碡一摇一晃的，我真以为是走了好远好远。有回我摇晃得过厉害了，碌碡给滚了半圈儿，把我摔倒在地下，差点儿辄了脚，吓得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在那上面玩了。

东沟离村三里地，老有水，而且是很大的一片。里面常有小鱼儿哧溜一下游过，但你要是想把那鱼儿逮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试过不知有多少回，连半条也逮不住。逮不住鱼，我们就拿个小盘尼西林药瓶捉蛤蟆蝌蚪，回了家倒进瓷罐里养起来，等它把尾巴没了，变成小的丑蛤蟆，再把它倒掉，再捉新的蝌蚪来养。我们还在东沟水塘边采上马莲叶做小口笛“吱儿，吱儿”地吹。摘上棕色的蒲棒，相互敲打对方的头。把晒干的蒲棒儿搓揉出好多好多的毛绒团，再把毛绒团撕成小毛绒吹得满家满院都是，像春天的杨花絮轻飘飘地飞。

在大野地我们能捉住红圈儿蚂蚱，绿圈扁担。红圈儿绿圈儿我们是指它们飞的时候，翅膀展开的颜色和形状。绿圈儿扁担的模样像螳螂，后腿很长。我们捏住它的两条后腿说“扁担扁担悠悠，扁担扁担悠悠”，它的身子就在空中一下一下地悠。很好玩儿。

在大野地还可以进入谁家黍子地拔霉霉吃。霉霉甜甜的，真好吃。有一点不好是，吃完霉霉以后看吧，一人一个黑嘴唇圈儿。

南泉也是我们的好耍处。南泉是个村，在我姥姥村北。南泉有个供销社。我常偷了姥姥家的鸡蛋到南泉供销社换吃的。怕姥姥发觉，我每回只偷一颗。一颗鸡蛋就能换七块糖蛋蛋。我给姨妹两块，穗儿两块，我留三块。穗儿分的糖蛋老不舍得吃，最后让我们要过家家时咬碎分了。

穗儿和我玩的时候，起初是什么也不称呼我。后来不知从多会儿开始，就叫



我“我哥哥”。我姥姥纠正过她好几回，说应当也叫姨哥。二姪姪也纠正说叫招人哥也行。可她一叫我就叫成“我哥哥”。姥姥村的人发“我”这个字的音不发我，是发“鹅”音。发“哥”这个字的音是“嘎”。这样，她叫起“我哥哥”就是“鹅嘎嘎”。我觉得这很好，很有意思。再加上她那脆灵灵的嗓子，整天“鹅嘎嘎，鹅嘎嘎”甜丝丝地叫着，我真高兴。

连住有好几天了，不见穗儿来找我玩。我已经偷偷地攒了有三颗鸡蛋，想等着和她一块儿到南泉供销社去换吃的，可咋等也等不来她。她家有个愣舅，一发起愣就打人。吓得我从不赶到她家。这次我想让姨妹领我去。起初姨妹不跟我去，说怕愣舅。后来我说换上糖给你好多好多，她才答应了。

穗儿原来是有了病。她枕着个油腻腻的大枕头躺在后炕，身上盖着条很脏的看样子是她妈的单裤子。见了我们，她坐起来，但蔫蔫歪歪的，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活泼劲儿。她的头发又是乱蓬蓬的了，脸又是脏兮兮的了。脸上还有哭的时候用手指横着抹泪留下的黑道道。

穗儿的妈个儿头不高，邋里邋遢的。但她的脸面长得不难看。她的右眼下面的颧骨那儿长着个黑痣。起初我以为那是不注意粘贴上去的西瓜籽的壳儿，后来才看出那是长在脸上的。

我跟穗儿说我给你上供销社换糖去。姨妹说姨哥有三颗鸡蛋，能换好多。穗儿笑着点点头。我领着姨妹返回姥姥家，从堂屋的泥瓮后头够出那三颗鸡蛋急急地赶到了南泉，但供销社的铺板门紧上着。扒门缝往里瞭望，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门前有摊卖凉粉的，姨妹想吃我也想吃，但不知道鸡蛋能不能换凉粉。我试着问卖凉粉老汉，他说：“拿来。”我只给了他一颗鸡蛋，他就满满地给我们打了一大碗。辣椒油红红的闪亮儿，每一个油花儿里有一颗太阳。那粉往嘴里一吸，“忽溜忽溜”地响。真香。可没给穗儿换上糖蛋蛋，我心里很麻烦。走在半路我一下高兴起来。姨妹给想起姥姥家有黑糖。

姥姥家的黑糖是很宝贵的。怕孩子们偷吃，锁在柜里。只有在哪个孩子得了病，才够出给治病，黑糖保存的年长了，很干很硬，像块石头，用手根本就掰不开。姥姥把黑糖块放在案板上，用刀往下削刻。孩子们不管是有病的没病的，一齐都把姥姥围起来，看她一手把住糖一手把住刀，很费力地往下削糖末儿。黑石头似的硬糖块被刀削刻过的地方露出白茬茬，刻下的黑糖末儿也都是白色的。